



# 城市地铁品牌识别的整合传播设计与人文价值积淀 ——从伦敦到东京、香港

The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and Humanistic Value of Metro Brand Identity:  
From London to Tokyo and HongKong

娄文冰 Lou Wenbing

**内容摘要** :通过对伦敦、东京与香港三大城市地铁品牌规划系统的考察与研究,重点对城市地铁品牌识别的整合传播设计和人文价值的积淀展开深入解析。国际一线城市地铁品牌的成功经验可作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城市品牌发展的它山之石。

**关键词** :地铁品牌、整合传播设计、人文价值

中国城市的轨道交通事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飞跃式发展期。据最新报道:“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全国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总投资规模预计超过 8000 亿。”<sup>[1]</sup> 如果将运营与在建、筹建项目汇总,今后我国约 48 座城市的轨道线路规模将超过 3400 公里,投资总额超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最火的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市场。反观目前诸多国内城市推出的地铁形象,其品牌整合传播设计的专业性、人文深度与国际水准仍有较大的距离。此差距仰赖于设计师以及城市管理者们共同的智慧而非火热的“投资热情”可以弥补。笔者结合历年对“地铁品牌识别整合

传播”的考察管见,选取伦敦、东京与香港这三座典型城市的案例,对地铁品牌设计的专业智慧、人文价值进行一些思考和探索。

## 一、三大城市的地铁品牌标志比较

伦敦地铁(London Underground)是全世界第一条地铁。百余年来,伦敦地铁在其品牌识别上历久弥新。伦敦地铁的“红环蓝杠”品牌标志(图1),与其说是创意、感性的设计,不如说是“精准诠释”及“沟通价值”的综合传播科学实验的理性之作。作为其标志前身,被称作“牛眼、枪靶(Bulls-eye、Target)”的图形最早是19世纪伦敦公交总公司的标志。这一图形精简地诠释了“车轮、线路、站点”等核心传播概念,且站名组合、站台空间等均具有颇高辨识度,于1908年为伦敦地铁所采用。1913年,受聘于伦敦地铁的设计师爱德华·约翰斯顿(Edward Johnston)改变了标志的比例,将实心圆更改为圆环,在横贯红环中央的深蓝色条中标入“UNDERGROUND”字样。1919年,

系统规划设计后的新形象正式投入推广和应用。时至今日,伦敦街头虽风貌巨变,却仍可清晰辨识出每个地铁车站的百年“红环蓝杠”标志,而中央横杠中则可巧妙地组合每座站名。这套视觉识别系统早已成为品牌识别设计的典范与标准之一。

香港地铁(MTR)开通于1979年,其品牌设计颇为成功:深红色底上,上下的两个半圆环,分别代表九龙半岛与港岛的地理特征,中央贯通的竖线则象征了跨越维多利亚海港的“贯通、联系”,同时表现了轨交的两站与其营运区间。深红椭圆形块与反白线条的整体组合,颇似一枚“阴刻白文”的汉字闲章,暗具东方的人文联想。(图2)港铁标志中的“圆环、横贯线”,依稀可见伦敦地铁标志的视觉痕迹。

至于东京,作为亚洲最早拥有地铁系统的都市(1927年开通),其地铁线路的密集完善、便捷与复杂度在国际上绝无仅有。它的城市地铁线路分别由东京地铁公司(Tokyo Metro)、都营地铁公司(Toei Subway)以及日本国铁JR的

部分线路(如“山手线”)共同组成。其中都营地铁(Toei Subway)因由东京都政府经营,故采用东京城市标志“银杏绿叶”。东京地铁(Tokyo Metro)则设计为天蓝色的“M+ 心型”标志(图3)，“M”取自“Metro”首字母，“心型”图形则蕴含了它的品牌理念——“东京之心(Tokyo Heart)”。笔者认为东京地铁在其品牌理念、识别系统整合传播的总体规划上略胜一筹。

## 二、地铁品牌识别的“整合传播设计”

如果将标志的设计视为一粒“种籽”，那么品牌的整合传播设计则是那棵参天“大树”。在“种籽”到“大树”甚至“树林”的动态生长过程中，如园丁般全程跟进的“设计管理系统工程”比“设计”本身更为重要，这也正是品牌“整合传播设计”专业智慧的价值意义。

进入本世纪，伦敦地铁和公交很多年前采用的这套“红环蓝杠”标志，在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接管整个伦敦交通系统后，将其变换各种配色后用于出租车、游船、DLR 轻轨等其他交通工具，甚至成为伦敦交通局的标志。(图4)至今，“红环蓝杠”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伦敦，乃至英国的象征。较之标志，伦敦地铁的英文字体设计虽并非为公众所皆知，但对其品牌整合传播却有潜在的巨大效应。1913年，爱德华接受设计委托后，同时研发设计了人文主义无衬线字体。这套字体于1919年推出，其后不断完善，至今仍全面应用于公交系统站名、线路图、导识牌及广告宣传等全面的品牌识别之中。(图5)随着地铁线路的扩张，伦敦每条线路都建立了识别色：如“中央线”为红色、“东伦敦线”是金黄色、“维多利亚线”是浅蓝色等等。因此，伦敦人会直接用颜色来指代某条线路，比如“今天坐红线上班；转黄线去看音乐会”。

伦敦对世界城市地铁“整合传播识别”的范本式影响还来自它开创性的“线路图”设计。1931年，第一张“地铁交通线路图”由英国电子工程师亨利·贝克(Henry Beck)完成。两年后，贝克又更新了线路图的设计。(图6)这一设计极具创新，突破了距离和空间位置的局限，重点显示了地铁站的位置和线路关系，但与实际地理坐标并不完全挂钩。因此图中只采用直线及45度斜线转角为基本设计元素，加上每条线路独特的颜色、清晰的字体标明站名，圆圈标明线路站点的交叉换乘，简洁实用，一

目了然。贝克的伦敦地铁线路图设计，其设计思想是拓扑学<sup>[2]</sup>的一个范例，同时也是世界平面设计史的经典杰作之一，奠定了全球所有地铁交通图乃至各类交通图的设计基础。无论是今日伦敦地铁，还是香港、东京或其他城市的交通线路图设计，都可溯其渊源。

地铁品牌识别的“整合传播设计”，不仅仅体现在图形、色彩、字体、线路图等识别的视觉表现层面，同时与其“词语识别命名体系、信息编码模块”等非视觉信息有着重大关联。伦敦、东京、香港这三城地铁的线路命名都选取“主题关键词”。例如伦敦的“中央线、维多利亚线”、香港的“港岛线、荃湾线”，东京的“银座线、新宿线”等。当这一词语识别与命名编码体系应用于视觉识别、公共导识设计时，可以为复杂线路提供一套简洁有序且可跨语言障碍的信息识别传播工具。(图7)以“涩谷站”为例，其编码“G01-F16-Z01”清晰准确地表达了银座线与“F-副都心线、Z-半藏门线”三线之间的相互换乘，及其车站的序列关系。东京地铁线路之复杂众所周知，然而其整合传播设计与公共导识体系的便捷、高效同样闻名于世，上述系统可谓功不可没。反观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地铁品牌识别系统中，仍以“1、2、3”等数字编码而已。

## 三、地铁品牌识别的“人文价值积淀”

杰出的城市地铁品牌识别的整合传播设计，除了助益于提升其商业竞争力、体现公共交通传达识别功能等之外，也会自然积淀、融汇为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如：伦敦“贝克街车站(Baker Street)”为5条线路的枢纽站，在其站台上特制铜牌，上铸铭文“此站台系1863年世界第一条地铁的一部分”。此外，贝克街站台在广告位之外特意留出生动描绘历史情景的海报位，堪称伦敦地铁历史的博物馆。“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作为交通枢纽早已闻名遐迩，又因电影《哈利波特》在此取景，此站成为世界各地游客尤其是影迷们到伦敦的必游景点。东京地铁银座线“浅草站”也有类似的铜制铭牌和老海报。由浅草至上野的地铁线是亚洲第一条地铁，于1927年开通。站台上的老海报有大字标题——“东洋唯一地下铁道”，画面上是时髦男女、老老少少满面喜气的候车场景。(图8)而香港地铁在站名识别设计上，除了使用常规站牌之外，在站厅墙面上置有一人多高的巨大中国书法字体站名，使得“铜锣湾、湾仔”等名称平添一层文化

符号的视觉传播意义。这对华人或汉字文化圈的东方人而言，具有“文化基因”的认同感；对非汉字文化圈的西方人而言，则是“异国风情、异域文化”，乃至香港城市的个性名牌。

伦敦与巴克莱银行合作推出“伦敦自行车(Cycle Hire)”计划，除色彩系统为“天蓝深蓝”的组合外，其标志图形、字体系统等俨然是百年品牌识别的再演绎。(图9)在旅游纪念品商店里，伦敦地铁品牌标志以及线路图等相关图案素材被广泛应用在各种纪念品的设计上。伦敦地铁与英国国家色彩识别一致的品牌及线路图甚至与英女王头像组合一起，推出专门的纪念邮票。(图10)伦敦地铁的品牌形象已提升为城市形象乃至英国人文历史的代表与象征，其品牌沟通力远远超越了地铁品牌范畴。

## 结语

依笔者浅见，目前国内城市的地铁品牌设计、工程导入执行成果，就城市景观与公共服务精神而言，在专业眼界、设计智慧等诸多层面距离品牌识别“整合传播设计”尚有差距，遑论地铁品牌的“城市人文价值”的传播与积淀。对于伦敦、东京与香港等城市进行地铁品牌“整合传播设计”的案例分析与研究，在中国乃“全球最大最火的城市轨交投资”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城市发展、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方面，均深具研究借鉴和深入思考的积极意义。

注释：

[1]“发改委批25项轨道交通规划 总投资超过8000亿”，《京华时报》，2012年9月6日。

[2]拓扑学(Topology)：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研究连续性现象的数学分支。例如“地图4色定理”即最为人知的研究范例。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新世纪出版社，广州，1998。

[2]董炳月：《茫然草——日本文人风景》，三联书店，北京，2009。

[3](日)青木荣一主编《东京地铁详解词典》，日本实业出版社，东京，2004。

[4](英)阿姆斯特朗：《基础拓扑学》，孙以丰译，人民邮电出版社，北京，2010。